

青瓷之美

劉良佑

如眾所周知，中國傳統文物博大精深，尤其是陶瓷文明，更是對人類文化一項重大的貢獻。從近年來考古資料中顯示，中國早在西元前 1500 年的商代中期，就已經開始燒製原始青瓷了，只不過那時的各種相關技術，都還在萌芽的階段，無論是製坯、鍊土和燒造都相當原始，所以我們稱之謂「原始瓷」。

其次，從考古資料中，我們也得到另一種啟發，那就是在東漢以前，雖然基本上陶和瓷的工藝技術是相通的，但是從周代起，窯工們顯然已經注意到，陶土和瓷土不僅在製作時的材料性質上有所不同，而且在燒成後的結果上也不相同。為了發揮不同土性的效果，在西元 200 年前後的東漢早期，陶和瓷在窯工們的努力下，終於從原本單一的技術，因不同的材料而演化為兩種不同的生產路線，現代型的瓷器和陶器於是就誕生了。因此，從歷史發展上來看，陶和瓷事實上是原始陶瓷工藝，在演進過程中，技術上複雜化和多樣化的結果。所以瓷器並不是由陶器演變而來的新觀念，得以為吾人所認知。因為若沒有「瓷土」原料，「陶土」是無論如何也不會「演變」成瓷器的。

中國青瓷的生產，南北朝之前重心在東南浙江杭州灣一帶，經南北朝和隋代之後，全國各地重要的窯場，也都能生產青瓷。隨著唐代北方強大的政治力和經濟力的集結，青瓷的重心在洛陽和西安這兩京所在地的附近，開始形成另一種風貌。

在唐代長安北郊的黃堡鎮耀州窯遺址中，除了出土大量的唐三彩作品之外，白瓷、黑瓷、花瓷、茶葉末瓷、裸胎黑花瓷等等，數量也不在少數。尤其是在唐代中期以後，耀州窯遺址中也出土了一些典型的北方青瓷標本，這些標本的釉色和南方越瓷有明顯的不同之處。南方越窯青瓷的釉層極薄，多數為黃綠色(艾色)，少數為青綠色。而唐代耀州青瓷則釉層肥厚，色澤溫潤為暗綠色。從觀念上而言，說早期耀州青瓷是受南方越窯影響而生產的，當然有發展上的先後意義。但就從純技術的角度看，耀州窯早期青瓷在製作上和材料上，顯然又有地域性的強烈風格。從這個方面去思考，我們發現耀州早期青瓷的製作，又和當時北方盛行的茶葉末釉器，有著更深一層的淵源。

耀州窯青瓷發展到五代晚期和北宋初的時候，進入了另一個高峰。由於耀州窯胎土一般含鐵量甚高，只有極少數的白土生產，所以除了少量白瓷外，一般的

白土多數用來作化妝土使用。當時的青瓷，胎土外表都有白色化妝土，滿釉支釘燒十分精美。不少精美的作品，受唐三彩貼花技術的影響，瓷雕風格很濃，器型豐碩華麗，加以在化妝白土上針刻細花，配以天青釉色，十分引人注目。這類器早年被誤定為「東窯」，在今天已被中外學者正名為五代末北宋初的耀州窯了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五代耀州窯遺址中，也出土了少量底刻「官」字款的青瓷碗盤標本，和針劃化妝土的龍紋殘片，證明在這一時期，耀州窯曾經為官方生產過青瓷。由於標本狀況與傳說中五代「柴窯」的特徵很相近，很引起大家的關切，真相到底如何，還需要考古工作者的努力，來解開這個謎題。

北宋時代，耀州青瓷製作得更加精美，從中期之後胎土鍊製精細，含鐵量大為減少，白化妝土也漸次不用，碗盤圈足高挺而規整，成為宋代宮廷的貢瓷。流風所及，整個中國窯場都仿燒耀州青瓷器，像華南廣東西村窯、江西吉州窯和華北各窯都有製作。這其中尤其是河南地區仿燒得最多也最好。學者稱河南地區生產的耀州型青瓷為「臨汝青瓷系」，而河南地區的學者，則堅稱為「民窯汝瓷」。

經筆者前往河南各窯和陝西耀州窯窯址，實地比對大量標本後認為，就外觀而言，兩者之紋飾與造形雖極為類似，但仍有些微差異可資分辨：

一、耀州窯胎土中含鐵量稍高，河南青瓷的含鐵量稍低，經高溫還原後又在燒成末期氧化的結果，在底足露胎處的表面色澤，耀州窯是深咖啡色，河南臨汝系的是淡咖啡色。但若是釉不夠綠、還原不佳的產品，兩者的胎皮都是土黃色。

二、北宋早期耀州窯有白化妝土，河南臨汝窯這時還沒有生產此類刻花青瓷。臨汝窯生產這類青瓷，是在北宋中期才開始，比較重要的有臨汝、宜陽、新安、內鄉和禹縣、寶豐等地，其產量在北宋晚期最盛。

三、就釉色而言，耀州窯較濃綠，河南窯口生產多淡綠。不過其色澤之濃淡，與施釉厚薄，以及燒火溫度和還原的氣氛有關，所以此點只能當作一項參考資料來考量。

四、在紋飾方面，耀州窯早期雕花、貼花和劃花都很盛行，晚期則以刻陶模印花為主，少量貢瓷上有龍鳳紋飾。河南地區青瓷，則只見少量劃花作品，大多數是刻模印花器，以盃盤為多，少量盒子，瓶罐類極少見，也不見有龍鳳紋飾。

五、我個人覺得，真正容易分辨耀州窯和臨汝系青瓷的，還是在製胚的工藝技術上。就大體而言，臨汝系的青瓷胎厚，尤其在盃盤近足的部份較厚。而耀州盃則上下厚度較接近，這只要上手一摸就知道。其次在切足方面，耀州窯足型極規整，下刀剛勁有力，尤其是北宋中晚期的器物，圈足內外壁都直而細薄。同時

期河南臨汝系青瓷，切底修足都低淺，大多不甚規整，其中只有新安城關窯切足較高，但圈足比耀州窯要肥厚些。另外，凡是碗盤花紋中，帶店家字款的，如：和、吳、吉、同、劉、思等字是宜陽窯，而帶：吳、楊、張、同、惠字的是新安窯產品，都只見於河南青瓷。至於耀州窯中，則只見「大觀」「政和」等年號款器物，而不會有私家款。

南宋之後，北方先為金國後為元代的版圖，青瓷在北方衰落得很快。入元以後，原來北方生產青瓷的窯場，都轉而生產磁州窯系和鈞窯系的產品，青瓷的重心又因宋室南渡以後，再在南方的龍泉窯系興起。

關於鈞窯的天青釉系，基本上可視為北方青瓷的一個旁系。從釉藥成份及發色原理來看，釉中磷酸鹽的作用，使其傾向於乳濁青瓷去發展，而這種視覺美感，也啟發了北宋晚期汝官窯和汴京北宋官窯的製作靈感，使我國青瓷由薄釉刻劃紋，轉向厚釉素面的審美效果。在這種轉變上，河南地區所生產的「綠鈞」，無疑是此一轉型期的重要關鍵產物，可以視為宋代官窯系的前身，因為有「綠鈞」的出現，才有後來「汝官」的出現。我們認為，近年在河南寶豐縣清涼寺村汝窯遺址附近窖藏中出土的一批青瓷，從其粗略的製作手法看來，說它是「汝官窯」的名品，倒不如說它是「汝民窯」，或者是宋代官窯系的前身，還來得更恰當些。由於「綠鈞」和「汝瓷」在釉藥上的關聯性，因此「綠鈞」在陶瓷發展史上，今後應當給予一定的地位才對。

龍泉窯是受宋官窯影響而出現的這一事實是不容否定的。在此之前，龍泉所在的甌江流域，只生產越窯型的青瓷薄釉劃花產品，基本上是越窯的旁系。宋室南渡之初，為應宮室器用之需，在東南地區廣徵窯場造器以應急用。今天所知有官窯標本出土之窯口，有浙江上林湖的彭東鄉、浙江龍泉縣的大窯鄉和溪口等地。另外，經考古發掘知道，烏龜山下的「郊壇官窯」窯址，在燒製官窯前，也曾經是一處燒製越瓷的窯場。

南宋龍泉窯在初期生產的宋官窯型瓷器，以原来越瓷系的圈足墊燒法為主，不見任何支釘燒的標本，其他樣式造形則與郊壇官窯無二，尤其是鐵色胎足與釉色紋片都甚精美，稱為「龍泉官窯」。當時地方民窯也以紫金土仿官窯器，惟釉色青綠不開紋片，外觀與一般龍泉較接近，稱為「黑胎龍泉」。後因紫金土為官業禁採，是以黑胎龍泉傳世不多，亦頗珍貴。而一般龍泉產品，則以灰白瓷土為胎，胎質斷面較官窯和黑胎龍泉肥厚，白中略泛青色，露胎處有淡棕色胎皮。

龍泉窯青瓷在南宋晚期進入另一個高峰，堆塑的龍虎蓋罐和刻蓮花紋的盃、

盤、鉢、瓶等等，為此一時期的代表。進入元代後，菊瓣刻花和貼花裝飾十分盛行，外銷型的盃、盤、罐、瓶則形體碩大。生產青瓷的窯場，由浙江南部向福建擴散，從閩北到閩南的廈門附近同安一帶，都燒造龍泉系青瓷。同時，元代官方也在龍泉窯燒用品，1976 年在南韓新安附近發現的沉船中，曾找到元代「使司帥府公用」刻款的龍泉盃，就是一個例子。

龍泉窯青瓷的燒造，雖然說是受了宋代官窯燒造，而發生風格上的轉變。但是龍泉窯除了生產厚釉青瓷外，也有其不同於官窯系的刻劃花地域性風格之產品。這種青釉刻劃花作品以盃盤為多，最初出現於北宋中晚期的龍泉窯址中，盃盤內外以明快的刀法，刻劃流暢的蓮花紋飾，有時在盃盤的外壁，刻以放射狀直線紋、由足底為中心，向口沿外側散射出去，也有部分看來似渦旋紋的。這不禁令人想到當時北方耀州窯系盃盤的作風。從北方耀州窯對北宋江西、廣東等地青瓷製作的影響來看，浙江龍泉的這種產品，也不無受耀州青瓷影響的可能。

這種刻劃紋青瓷盃盤，向海外輸出的不在少數，有不少人將之誤認為是耀州窯的產品。日本茶道之祖珠光和尚甚愛此物，因此，一般俗稱之謂「珠光青瓷」。珠光青瓷的產地很廣，整個福建地區和浙江南部的窯場，在元代都生產這種青瓷。有些日本陶瓷書籍，也稱之謂同安窯系青瓷。不過其中最精美的，仍是龍泉窯的產品，一般而言，龍泉窯修足規整，器足內外施釉，而福建諸窯的作品，足內底多無釉，有時器外近足處為裸胎無釉，是分辨不同地區窯口一個簡略的方法。

入明以後，龍泉窯漸漸衰落，代之而起的是明官窯的仿龍泉青釉器「豆青」。明代官窯從宣德時期起，大量燒製龍泉青釉的產品，但因為景德鎮官窯胎土較白，因此釉色青嫩，十分討人喜愛。從明代宣德時期開始，到清代晚期止，各代都有燒製豆青官窯的紀錄。流風所及，民窯也有不少佳器傳世。民國以後，各地窯場仍然陸續製作從未間斷。因此，就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，青瓷可以說是我國瓷器歷史上演變的主流，從商代開始，直到如今，為三千多年的陶瓷發展，作了最好的見證。